

我的文化情结

□ 朱子青

我从事教育工作15个春秋，记得那时在家乡迎接村小学任民办老师，正赶上学“小靳庄”，村级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拉二胡、京胡，加上喜欢搞文艺创作，自然就成了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力量，后来又抽到上级宣传队从事节目创作和乐队工作。

那些年，我常年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演出，到水利工地演出，参加全县文艺汇演。在水利工地，我们都在农户家中打地铺睡觉，到食堂吃钵子饭。虽然生活很苦，但也很充实。演出时，大家一边拉拉唱唱、蹦蹦跳跳，我就在一边写节目，很多节目都是现场采访，现编现演。那帮武汉知识青年们可厉害了，节目单一发到她们手中，两分钟就能脱稿演出来，那时最能反映真实情况的节目形式就是《湖北慢板》，都是五、五、七、五的句子，经过那些小姑娘一口流利的汉腔演绎，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，这些精彩表演总是收到观众异口同声地赞美：“刚刚才采访，一会儿就上节目，真快呀！”

宣传队里有一名女生叫杨荣慈，1米78的个头，她是武汉东湖中学的文艺部长，舞跳得特别美，由我创作的歌舞节目《十朵红花洪排开》采用荆州花鼓戏《花墙会》中的《折花》调改编配乐，加上精心编排，该节目在县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。还有报幕的女生叫夏妙玲，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十分悦耳，每天演出结束

后报各大队政工员送来的人好事宣传稿件，不少人都喜欢聚集在工地广播站听她播音，直到播报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由于长期在热闹的环境中写节目，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——越吵写得越好，以至于我后来任党办主任写重要材料，都是一边和同事聊天一边写出来，即使一个人在家也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写文章。

1982年，全县招聘文化干部，条件是热爱文化工作，一专多能。由于我长期从事文艺工作，会说、会写、会拉、会唱、会跳，在领导的关心和举荐下，我当上了朱河区文化站长，乡镇合并后任朱河镇文化站长。

其实文化部门是“清水衙门”，除了每年县文艺汇演有2000元—5000元经费外，平时没有任何工作经费，抽调演员全凭个人感情。演员排演、汇演一不招待生活，二不发放补助，不少演员看中的是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。

我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全省开展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。监利县的重点是收集整理我县民间文学《三套集成》即《监利民间故事集》《监利民间歌谣集》《监利民间谚语集》。我多次深入到各村组农户家中采访，收集整理了民间故事20多个、民间歌谣20多首、民间谚语2000多条，可以说《监利民间谚语》基本上以我收集整理的资料为蓝本。同时，我还协助周锦城、张金阶两位优秀同志参与了《三套成集》的编审工作。这

些辛勤付出都获得了县文化局领导和县文化馆领导的充分肯定。监利电视台还采访播放了我个人专题《浓墨重彩写乡情》。

2000前后，监利县少数“自由撰稿人”撰文诋毁自己的家乡，县委宣传部为了反制这股歪风，宣传正能量，委托县文化局组织一台宣传监利改革开放成就的春晚节目，要求创作主打节目，用事实说话。时任文化局副局长夏香元同志负责节目组织工作，他和我同是老乡，对我很了解，指定我写两个节目，并提供了有关资料。

我只用了一个下午，就写好了两个节目，一个节目是快板书《监利好地方》，200多句，采用“江阳辙”一韵到底、朗朗上口。由师范学校36名女生表演快板舞，舞台气势壮观，语句铿锵有声，场内热情高涨，掌声经久不息。另一个节目是反映县城新貌的歌舞小品《王老汉进城》，由县花鼓剧团著名演员杨建奎、雷蕾、刘芙蓉等连袂演出。杨老师风趣幽默的演出，博得了场内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这些年，我为监利春晚创作了很多快炙人口的文艺节目，如《省委书记访农家》（朱妹演出）、《回乡》（杨建奎等演出）、《送锦旗》（杨建奎等演出）、《监利明天更辉煌》（朱正红、王艳芳等演出）。最近的是2019年监利县委老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节目，我创作的快板舞《监利好地方》（武礼新、朱彩虹等演

出）得到县委领导高度肯定，夸奖“节目写得好”，在我看来这份肯定比物资奖励更珍贵。

由于我对监利县文化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2011年，被荆州市人民政府评为“全市十佳基层文化工作者”。

人老了，退休了，该休息了，可我对文化的挚爱丝毫没有减，文化局领导对我的关爱也没有减。退休后，文化局返聘我工作了10年，镇政府聘请我担任《朱河镇志》主笔。在我看来，这都是对我最好的肯定。

我总是闲不下来，每年都协助组织京剧票友开展常规演唱活动，和长沙市京剧票友联谊会、岳阳市京剧票友联谊会、监利市京剧票友联谊会、文化馆京剧票社、楚剧票房、黄梅戏票房开展文化联谊活动；协助组织朱河诗友与监利市诗友、荆河诗友、荆南诗友、洞庭湖文学协会开展诗咏活动。仅今年就开展了3次大型活动——市诗联学会朱河自来水厂采风活动、清明节祭扫先烈崔琪活动、汴河镇荷叶村诗词采风活动，并且是京剧、电声乐队和诗友进行互动联欢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继续我的发挥余热。

最近，我接到了市老年书协的邀请，准备参加监利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书法作品展。同时，也接到了市老年艺术团邀请，让我创作春晚节目。我都欣然接受，一定不负所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奉献给监利人民。

又是一年高考季

□ 夏新平

纹，每天和他一趟一趟拉着沉重的水泥，身子弓得像两只大虾，特别是遇到上坡时，肩上背绳几乎勒进骨头缝里去，身体也差不多快要贴在地上了。

一天清早，我吃过早餐往工地上去，看见我的搭档独自蹲在一堆碎石边，双肩不停地抖动，走近才发现他在哭泣，手里捏着一封皱巴巴的信。问他咋回事？好半天他才说，家里来信说屋里养的几头猪都死了，四个月大的孩子也没有奶吃了，让他寄点钱回去。而他出来打工几个月了，还一分钱工资都没有结到，每天都是早上在食堂里买几个馒头用热水一泡，就着几根咸萝卜干把肚子填饱。当时已是隆冬，气温在零下三四度，他还只穿着一条单薄的裤子，脚上一双破旧的解放鞋，鞋底都快要脱了，用一根麻绳缠着，光光的脚指头全部露在外面，望着他一半是伤心一半是寒冷而抖动的身子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晚上收工的时候，我把身上穿的一套军用品绒衣脱下来，连同我手上的20元钱一起递给他，这位四川老乡接过钱物，热泪长流，哽咽得不成样子。记得那天冷，我是跑了十多里路回家的。如今好多年过去了，不知当初的那位老乡现在怎么样了，但愿他幸福安好！

做工又脏又累，辛苦不说，还总是被人看轻。特别是每次结算工钱的时候，财务室的人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扣这扣那，真是气死人，不干了！我受够了！这时，回去读书的愿望在

我心中渐渐萌生，我想复读！从这时起，我又开始渐渐近书本来。

每天收工回家，我都会拐进城里的工人俱乐部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报刊，可以免费阅读。一天的活干完后，流连在那静静的阅览室里，就像蜂蜜叮在花蕊上一样，感觉好极了。说来脸红，不知为什么，每次在阅览室读书时，看见报纸杂志上的好文章，总是一种想要据为己有的冲动。抬头望望四周，没人注意，手就不自觉地伸向了早已盯准了的版面，轻轻撕下来，捏成一团，悄悄地塞进口袋，确认安全后悄悄离开。回到家中，洗过澡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品味一篇篇优美的文字，心里美美的，这阅读的愉悦感足以把偷撕报刊的羞耻感抵消得干干净净。

翻过年，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复读，当再次坐在教室，窗外的梧桐树已是满眼新绿。我的理科基础差，属于跛腿，在分析自身情况后，决定攻读文科。但该校没有专门的文科班，我只好插到理科生中，语文、数学课则在教室上课，其他时间就悄悄溜出教室，爬到校园里的梧桐树上，一遍一遍，反复牢记，直至烂熟。

学文科，语文算得上一个小小的优势，从小喜欢读书，不管是连环画还是小说文学作品都如获至宝，读起来津津有味，自己曾总结出三个最佳的阅读时间，饭前一厕前一睡前。每年最盼的是暑假，喜欢去乡下姨妈家走亲戚，不是冲着他家的枣树和竹林，也不是田间的青

蛙和小鱼儿，而是他家阁楼上的藏书，什么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等，还有数不清的发黄的《瞭望》《半月谈》杂志，趁人不注意，我就偷偷爬上阁楼，躺在一堆落满灰尘的书刊中，如痴如醉地读起来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

我最喜欢的要数作文课了，每当老师夹着批改好的作文本出现在教室门口时，我的心总会砰砰的跳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作文一般都会得到老师的好评，甚至会作为范文全部朗读出来，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作文《当看到地球仪所想的》还被学校油印发给全校学生阅读过。除了语文方面有一点自信外，数学可就是我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了，每天望着那些枯燥的数列公式，我如在雾里穿行，始终不得要领，看来我不得不放弃数学了。

班上的同学中，除了我是一个文科插班生外，还有一个外地转来的女生，也是复读生，不过是学理科的，性格很温和，学习也很用功，整天端坐在座位上很少作声。有一次我偷偷地翻看她的作文《雪》，写得很好，文笔不错。尽管一个班，但平时很少讲话打招呼，只是当我学习懈怠的时候，偶尔望到前面那位女生笔直的背影时，我会开始自我检讨，身上会增添一股发奋的动力。

又到六月了，夏季悄悄地来临，梧桐树的叶子已完全变绿。又是一年高考季，我再次站在了考场的大门口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多了一份勇敢和自信！

粒的馋嘴雀儿们。

几遍过后便不再新鲜，于是就猫在田间麦垄里异想天开地寻起兔子来。也真巧，我们狠命地敲打铁锄，赶跑了雀儿，也惊呆了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崽子。当我猫着腰走向田间一块茂密的麦子，眼前突然一亮，一条晶亮的弧线划过双眼，定睛看时，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麻灰色小兔正惊恐地蜷缩在那里，似乎有些发抖。我蹑脚过去，两只手一起罩下，逮了一个正着。于是，我便大声呼朋唤友：我逮着兔子啦！一下子，所有伙伴从田间的四面八方向我涌来，蹂躏了麦秸，惊起了那些全身灰白、嘴红尾翘、满肚金黄的雀儿们。

“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霎时间，头顶的天空一片斑斓……

邻居“王爹”

□ 曾繁华

我的邻居王爹，是个“玩艺人”。平时爱跟他人开玩笑。有事请他，他也十分热情。他的熟人多，平常琐事还蛮能干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好“逞能”。

王爹，73岁，性情开朗，身子硬朗，平时不见他打个喷嚏。柘木乡大王庙村人，搬来小镇居住也有一些年头。他的村子离薛潭较近，一口带薛潭口音的话说得响当当的。其大名叫王炳炎。用他的话说，他有“三个火”（炳炎），“火头旺”；读了六个“一年级”，读的书还不多吗？他的风趣就在平时的玩笑中。

如果有熟人打他家门前走过，他总要说几句“半阴半阳”的话。到了吃饭时，他一句“喂食了吗？”见有人夹着报纸（豹子）走过，他说：“你怎么不捉老虎？”如遇下雨，他就说“不怕老虎就怕屋漏”。要是你在晒衣服或者洗菜做饭时，他的俗语又来了，“男做女工，到老不中。”究竟包含什么意思，只有他自己才清楚。你与他对话还得反应要快，不然就被他蒙在鼓里。人们开始听他的“怪话”还有点厌烦，后来反而觉得好笑。他就这么爽快，说出的话就成了生活中的调味品。

他不光说话风趣幽默，还是一个能干的“多面手”。他当过17年的村干部，是开车师傅，是机械“修理师”，还是“杀猪佬”，熬糖打豆腐一体执行。说起年轻时帮食品组杀猪的事，“刀子把儿都是钢”。他说，杀年猪真有讲究。那370斤重的大肥猪要挂上梯子很不容易，只能到案板上“开鞭”（剖开）。他年轻气盛，懂技巧，又见穷，杀猪是一把好手。经常去当地食品组帮忙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天。食品组还奖励他一套杀猪工具呢。

老人不光嘴巴会说，还真心结交人。各行各业都有熟人，稍有点名气的人他都能说个子丑寅卯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出自他的口里就成了故事。远近几十里的俗语他都说得神气活现，还能讲出因“助语”而带来的误会。什么张家的传闻、李家的趣事、王家的美谈他记得清楚，讲得有味。

前几年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，王爹在开垃圾车。那一段时间的清洁他最讲究，每天都是起早摸黑，运送一趟又一趟。春寒料峭，连棉衣也汗湿了，每天都要洗澡换衣。以十分负责的态度，把所管辖地方的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夸奖。

后来，他在某学校当保安。在时间上坚守，在人来人往中尽职，与师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。就是后来回家了，有些老师还来问候，要接他喝酒呢。

年纪大了，王爹不能再出门做事，就在家干起了婆婆妈妈的家务活。孙儿放假在家，他一大早就做好早餐。要是喊孙儿下楼过早，那声如洪钟，嗓门高八度，这条巷子的人们都听得到。老人们说他的“中气”好。

平时，他常常早起。打扫鸡窝，清理垃圾，端个食盆泼洒一地稻谷给圈里的“土鸡”喂食。常常是坐在小凳子上择菜、洗菜、整理家什用具，不声不响地做手工。要晒衣裳了，他推出两个大钢架，架子上晾着满滴的自家的和儿女家的衣物，衣架挂得整整齐齐。见熟人走近，他免不了说上一两句俏皮话，然后“叭”着一口烟，又去忙活了。

邻里有人外出，托付王爹一些事，诸如留心一眼、收收衣物等，他都一一办妥。天气变化无常，不知不觉下起了雨。“下雨啦，还不收衣裳？”“还要等到下露水才收吗？”一听就是他的大嗓门。说着说着他就拎着一大袋衣裳给邻居送上门。就说买一口小锅吧，是生铁好还是熟铁经用呢？家用选哪一种为好？问问王爹，他会给你指点。要是自行车、电风扇等家用电器出了毛病，只要请王爹，他准来帮忙，直至修好了他才离去。邻里要杀一只鸡或是配个小零件什么的，问问他，也会帮助你。一副热心肠就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亮眼。

俗话说，熬糖打豆腐，冲不得老师傅。可是王爹，只要你请他，他就当师傅。冬月的天气，总有几分寒意。磨好的豆浆舀在锅里煮，至于豆腐泡子多要“醒泡”，他有办法。此时的王爹围着灶台仔細查看，头上冒着热气，不一会脱掉了棉袄，挽起了衣袖，手拿锅铲，掌握火候，生怕“涨锅”。待到豆腐在锅里煮开两三滚，要起锅冲浆了，他用茶匙撩着石膏粉。生石膏熟石膏各有区别，用石膏下重下轻、怎么冲浆，他自然心中有数。他说，打出的豆腐要不老不嫩才算好豆腐。

豆腐在小水缸里冲浆后，用锅盖盖着。王爹洗洗手，叭上一支烟，坐在一旁等候。约莫20多分钟才揭锅盖。他用筷子一插，筷子稳稳当当地竖在豆腐中，再用锅铲一盛，那豆腐就像镜子一样泛着光泽。王爹笑着说，豆腐打好了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。至于用包袱豆腐、开包（划开豆腐）等，王爹自有一套。他还拿出自家的“亮筛”、压板等用具方便邻居呢。

要晒干豆腐了，他自制的网兜、竹篓里放着成方成块腌制的豆腐，一一摆放晾晒。这干子豆腐一连好多天要盘进盘出。他说，咸鱼腊肉要晒得“糖红”，干子豆腐要晒得“黑红”（枣红）。他做事就是这么讲究。

王爹那样热爱生活，友善邻里。以他那种独有的生活方式，在这条小巷创造了一种和美愉悦的境界。

